

● 明清近代诗文研究 : 明清文章学专题研究

特约主持人 : 罗时进

主持人按语 : 近日,在最新的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评审中,“明清近代诗文研究”专栏顺利入选了第三批教育部高校学报的“名栏”建设工程。藉本期学报出版的机会,我们首先向钱仲联先生表示深切的缅怀,他当年提倡明清诗文研究,并提出在本校学报创设明清诗文研究专栏,其倡导和推动之功,永远值得后来者感激。同时,我们还要向长期关注和支持本栏目建设和发展的学界专家和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明清诗文研究在整个古代文学学科起步较迟,但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这一领域,相关学术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我校学报愿意为明清诗文研究者辟出一块园地,取精集萃,为该学科领域的发展继续发挥促进作用。我们期待学者们用严谨的学术方式表达对社会现实和重要国家历史问题的关切,也欢迎具有问题意识的纯粹的学术探讨;我们期待学者们以开拓境宇的精神涉猎前人未曾注意的领域,也欢迎用“接着说”的姿态深化已有课题的研究;我们期待学者们进行具有学理意识、形成知识结构的理论研究,也欢迎以朴学精神和方法进行文学文献的实证考据。在作者方面,我们期盼富有知名度的资深学者惠赐佳作,也希望中青年学者踊跃投稿。还要说明的是,“明清近代诗文研究”专栏旨在对明清诗歌和文章展开研讨,但对诗文所采取的是大学科的概念,大致除小说、戏曲之外的文体都包含其中。概而言之,本栏目的学术格局和精神风貌是开放多元的,相信唯取此道,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才能繁荣,本栏目才有更广阔的空间,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今后,我们将根据学科发展的走向、学术研究的需要,也结合稿源的实际情况尽量组织一些专题性的讨论。本期推出的是一组明清文章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严明等先生的《王鏊对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响》对王鏊在明代八股文发展中的贡献和影响做了缜密扎实的探讨,“接着说”说出了新意。周明初先生的《送东阳马生序 人物考》对宋濂这篇传世名作中所涉及的人物进行了深入的考证,颇具创获,极有助于对该作品的分析和进一步研究。杨旭辉先生的《“性情独运”理论主张下的尤侗骈文创作》所聚焦的是明末清初尤侗的骈文创作。尤侗是被关注较多的名家,但对他的骈文的研究,学界极少涉笔专论,本文立足于文本展开学理分析,富有启发意义。

王鏊对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响

严明 张荣刚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明代时文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经义八股格,俗称八股文。经义八股格经过永乐后百余年的发展,于成化、弘治年间趋于完备。成、弘两朝既是经义八股格达到鼎盛之时,又是王鏊由科举入仕途、时文写作活跃之时。明代经义大家首推王鏊,他的经义创作特征以及多次参与乡会试事的主考官身份,皆在明代经义八股格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探究王鏊古文宗尚与经义作法的关系,分析其经义八股格的结构特征,进而揭示王鏊在明代经义八股格定型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王鏊;经义八股格;古文;时文

作者简介:严明(1956—),男,江苏苏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张荣刚(1978—),男,河南南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4)02-0132-07 **收稿日期:** 2014-01-14

八股文,又称经义八股格,是明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体。经义八股格的发展形成过程,学界一般认为始于明代永乐而终于弘治,而从成化至弘治其格式趋于完备。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台阁体”冗沓肤廓之弊愈加显著,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论调已引起士人的广泛共鸣。人才选拔与程朱理学的联系变得更加直接和紧密,而士人亦大多依靠辞章记诵以博取功名。对于经义,明人已认为“盛于成、弘”^{① 1209},又谓:“至于成化、弘治间,科举之文号为极盛……深醇典正,蔚然焕然,诚所谓治世之文。”^{② 356-667}成化、弘治时经义之盛,是建立在八股格定型的基础之上的。王鏊对经义八股格的定型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清两朝学者对王鏊大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有谓“本朝举业文字,自永乐、天顺间非无佳者,然开创首功,惟文恪王公鏊为正宗”^{③ 3447}。有谓“制艺之盛,莫如成、弘,必以王文恪公为称首”^{④ 1231}。本文在考辨王鏊的古文渊源、行文之法以及时文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王鏊在明代经义八股格形成和定型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作用。

一、王鏊古文宗尚与时文作法关系辨

明初的古文创作,沿着宋元的路径,或尊秦汉或尊唐宋。永乐以后,始有三杨“台阁体”倡导以欧阳修为宗尚,呈现雍容华贵的文风;降及天顺、成化年间,余响流为冗沓肤廓之弊,王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文坛的。王鏊(1450—1524),苏州吴县人,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会元,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在朝居官三十年,正德初迁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出生之时,吴地文风与京城“台阁体”虽有所不同,但文章宗尚仍不出宋元诸大家。如无锡人邵宝,成化二十年甲辰科进士,他评论王鏊“为文先爱三苏,才思川涌,援笔如不能止”^{⑤ 3674}。比王鏊稍早的苏州人礼部尚书吴宽,成化八年壬辰科会元,也“颇好苏学,其于长公每若数数然者”^{⑥ 1272}。可见尊尚苏氏父子文章是吴地文坛的主要特色之一。

王鏊初尚苏文,除了受吴地文风影响之外,与当时科举制度亦有直接关系。据时人何乔新所言:“予少时从事举子业,先公尝训之曰:‘近时场屋论体卑弱,当以欧苏诸大家论为法,乃可以脱凡近而追古雅。’予因取欧、苏诸论熟读之,间仿其体,拟作一二,出示同舍生,莫不骇且笑。虽

予亦不能自信,盖当是时科举之士未见此书故也……此书一出,予知四方之士疾读而力追之,上下驰骋,不自踰于法度,如工之有绳尺焉,而场屋之陋习为之一变矣。”^{⑦ 11069-1070}何氏为景泰五年(1454)进士,辈分早于王鏊,其文中自言以欧、苏文为法,目的是为了提振当时考场卑弱文风。又据王守仁《太傅王文恪公传》记载:“成化甲午,应天乡试第一,主司异其文曰:‘苏子瞻之流也。’录其论、策,不易一字。”^{⑧ 1690}可见王鏊初试举业即以学苏轼文而崭露头角,而嘉靖时归有光亦云:“乡先达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论策以苏轼为法。”^{⑨ 1122}

对于王鏊为文所学,明代霍韬曾总结道:“早学于苏,晚学于韩,折衷于程朱。”^{⑩ 1120}此论看似全面,实际上并不确切。王鏊曾自言:“少读《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则往返三复,惜不得其全观之,后获内阁秘本手录以归,自谓古人立言之旨,始有丝发之见。”^{⑪ 1265}可见王鏊非“晚学于韩”,其少时即已学韩,只不过是韩门弟子而上溯学韩。宋元以来学古文者,虽亦有远承秦汉者,然大都承认韩愈为一代文宗。王鏊亦云:“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为圣,其法所从授,盖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于经,而得之邹孟氏尤深……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来无择,无择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诩得吏部为文真诀。可之卒,其法中绝。”^{⑫ 1264-265}上述两段话道出了王鏊学韩的途径,在他看来,学韩文莫过于由可之而上之,因为“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则可之是也”^{⑬ 1510}。

韩愈文章的特点,或奥衍闳深、雄浑简古,或横骛别驱、汪洋恣肆,或纤徐委备、曲折尽情。然而就韩文的结构而言,善于“成幅尺间架”^{⑭ 116}是一大特点,也是一大长处。正因如此,韩愈文章与明代经义就有了学理逻辑上的密切关联。清代人郑献甫认为:“韩文公《原毁》,篇前后皆作二整比……《原性》亦前列三等以后,即将三意申明。”^{⑮ 113}明代茅坤也谓《原毁》“此篇八大比,秦汉来故无此调,昌黎公创之”^{⑯ 1469}。韩文重间架结构,源于韩愈的精心作文。韩愈做人作文皆继承孟子,故“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⑰ 1170}。“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荅磨乎事业”^{⑱ 1143}。宋代苏轼做人作文得庄子者为多,其文章结构与庄子一样浑然天成,并无精心结构的意愿。故清代蒋湘南评道:

“子瞻才气廉悍，故间架阔。”^{14 3309}王鏊为文宗韩师苏，韩苏文章间架结构的特点，势必影响到王鏊的时文结构。

在北宋文章诸大家中，王鏊还对王安石古文情有独钟，认为“欧苏崛起百年之后，各以所长振动一世，其天才卓绝，顾于是有若未暇数数然者而亦多吻合焉。其时临川荆公得之独深，考其储思注词无一弗合，顾视韩差狭耳。”^{15 1265}清初时文名家李光地曾指出：“王守溪评文，谓昌黎后惟半山得宗派，不数欧苏，最有识见。”^{15 1453}李氏还评韩愈文：“追复三代，转有斧凿之意。”^{15 1447}论王安石文：“王荆公，气亦强，文亦古，但深求之，却是学成的，不是本来如是。”^{15 1453}又谓：“太史公文字，似不如昌黎一字不可增减，然其不如处，正是好似他处。太史公无意写出，昌黎有意裁剪也。”^{15 1322}总之，在李光地看来，韩文注重“斧凿”和“裁剪”；王文气强文古，都是精心作成，反而不如司马迁文那样自然流畅。李氏所论，揭示出王鏊继承韩愈和王安石文章传统的渊源关系。

成化朝的科举取士渐趋于“一唯科目是尚”，^{16 1384}三场试士亦仅重初场。文人学子大都认识到时文“非上乘之文”，^{1 1162}但为了得一功名，不得不沉溺其中，反复描摹。王鏊尝自言其年轻时揣摩作时文之法：“初将先辈旧作，及诸程墨一一讲解而习之，卒不肖；次将《左》《国》《老》《庄》之属句句而模仿之，亦不肖。盖肖与不肖，其机常在倏忽微妙之间，任之则成驰骛，执之则拂生机，于此调骀骀乎若可以上。”^{1 1162}可知王鏊最初大量揣摩仿效先辈的程墨佳作，从中揣摩时文作法，最终未能得法。此为明代永乐以后士林普遍风习，众学子“惟诵习前辈程文，以觊傲幸。”^{16 1112}王鏊亦然，从揣摩程墨佳作到摹拟古文作法，欲化古文辞为经义文以求新意，最后终于领悟到了时文“肖与不肖”间的差异极为微妙，所以能够超越模拟而自成一格，时文写作水平便向上提升。

王鏊悟到经义文要做出新意很难，因为经义为科举考试文，文意表达已被严格规定范围，写作时既不能照抄时文佳作，亦难以搬用古文辞为文，仿制程墨佳作反显陈腐，而摹拟古文辞则难合功令。清初钱谦益曾把明代经义分为举子、才子、理学三大类，而将王鏊时文归入举子之文，并总结举子时文的特点是：“本经述，通训诂，析理必程朱，遣词必欧苏。规矩绳尺，不失尺寸，开辟起伏，浑然天成。”^{17 11508}实际上，“遣词必欧

苏”、“开辟起伏”皆为古文词法，钱氏所言举子时文实际上是以古文之法为时文。清后期郑献甫，更直接指出了王鏊时文主要特征是“尽变古文之貌而谨密微至。”^{11 115}

由此可见，王鏊所言新作法实际上就是以古文为时文。是有意借鉴古文作法，使其符合时文的格式及功令要求，从而使古文辞与经义文浑然一体。古文与经义浑然一体之后，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经义文八股格。其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对偶文词，密集使用排比句式，结构上急促紧凑，以古文纯熟之法使其“谨密微至”。这样的经义文章，内容上是程朱思想的翻版表述，形式上则是古文句式的纯熟表现，文章矩度符合功令之需，格式也能适应取士程序，充分显示“戴着镣铐跳舞”的才华，因而能够脱颖而出，占据明清科考行文的主流席位。王夫之尝谓：“钩锁之法，守溪开其端，尚未尽露痕迹。”^{18 1169}所谓“钩锁”者，即古文中开阖照应的写法，王鏊化用此法为时文写作，影响极大，促进了经义八股格的定型。

二、王鏊时文结构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王鏊宗尚韩、苏文的章法，并精通古文创作的间架结构与裁对整齐。后将此类领悟化用到时文写作中，加强了字词的排比对偶，句式也更趋严整，遂开启了以古文为时文的写作风气。以下结合《钦定四书文》中王鏊的时文选篇，具体看其在时文写作中如何加强排比对偶、裁对整齐，从而表现出以古文为时文的文法特征。

其一，“君赐食”一节题文：“起讲”三句，继而一股讲“君赐食”二句，一股讲“君赐腥”二句，一股讲“君赐生”二句，最后三股议论，收结。此篇正文结构依题目而成，“起讲”后以三股讲题，三股议论；一股可以谓之散体，三股并称则互为排比，其特征是整齐中间以散体，散体中继以整齐。

其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题文：“起讲”四句，继而二股讲“百姓足”，两句过文后六股讲“君孰与不足”。依朱注解题，而后就所解题目例证而已。“起讲”处提出问题，皆依事而言理。王鏊所作此篇程文，内容上环环相扣，围绕题目反复说去，实得自战国文章纵横之法。正文依题目

目前王鏊的经义流传下来的不止11篇，如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收录其47篇，高塘《明文钞》系列收录13篇；本文所分析的王鏊经义，皆选自《钦定四书文》。

而分两部分,中间以过文相连。徒深于经义,不足为此;徒精于文法,亦不足为此。王鏊行文能够兼顾两端,允执其中,深得苏轼文章之妙。

其三,“邦有道,危言危行”题文:五句“起讲”后二股讲“邦有道”,五句过文承上启下,继而两扇讲“危言危行”,最后以三句收结正文,照应破承。“原起”融于“起讲”之中。就正文部分文法而言,散中有整,整中有散,时而排比时而散行,得韩愈行文之旨,亦是北宋以来作者为文常用之法。

其四,“邦君之妻”一节题文:“起讲”后散句讲“邦君之妻”,继而二股讲“君称之”二句,一句过文结上,又二股讲“邦人称之”二句,最后散体讲“异邦人”句。行文之妙在于排比对偶与否均依题目而为之,题目结构对称则讲题排比对偶,反之则以散体讲之。论者谓其“句句详核,股法变换参差”^{[19] 333},诚为得旨之评。此篇足见王鏊深于古文,行文变化错综,整而不厌、散而不乱。

其五,“武王纘大王及士庶人”题文:正文“起讲”后两扇立格。“原起”融于“起讲”之中。正文分武王、周公而立为两扇格,以朱注解题敷衍成文,其中每一扇内,结构循题之结构,或对或散,自问自答,结构严谨。就结构而言,已开之后归有光时文两大扇散体行文之法,故论者谓“震川本文恪之派而出入于唐宋大家”^{[20] 228}。然王鏊之文既无归有光文辞古典之特长,亦无其行文拖沓之毛病。

其六,“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题文:“起讲”处拈出周公,继而二股讲“兼驱”,四股讲“百姓宁”,四散句收结。此篇为王鏊成化乙未科场屋元墨,正文虽非由八股构成,然其格式正体现经义八股格式的一般特征。该文与是科主考丘濬所作程文,皆为成化、弘治经义的典范。方苞谓此文侧重讲“百姓宁”,而丘氏程文则侧重“兼驱”,“是其用意异处,俱先于反面透醒,是其作法同处”^{[19] 355}。所谓反面透醒法,即两篇皆以“周公不如此则”云云。王夫之以此文为据谓王鏊眼中只一韩愈,可见王鏊文渊源韩文之处。

其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题文:“起讲”后四股讲“思兼三王”,四股讲“施四事”,五散句收结正文。正文于“起讲”处点出周公,所讲“施四事”后二股皆以“公”称周公,故方苞谓“音调颇与后来科举揣摩之体相近”^{[19] 359}。方氏所谓“音调”者,即《明史》所言“代古人语气为之”^{[21] 1693}。文中“公”即指“周公”,是一种避讳的尊称,而《孟子》一书中皆直称前圣而不避讳。所以可谓之为

代言,但谓其代古人语气则未必。

其八,“晋之乘”二节题文:“起讲”后三股讲晋、楚、鲁三句,二股讲“一”,又二股讲“其事”“其文”二句,五句过文承上启下,继而四股讲“其义”句,最后散句收结正文,照应破承。此篇属于史事题,正文结构依题依意而成,叙事议论与行文散整相参差,是天顺前时文故法。而其整齐处多、散处少,此正如李光地所言“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裁对整齐”^{[15] 1458}。

其九,“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一节题文:“起讲”后六股讲“闻其”句,六股讲“未闻”句。正文结构依题目结构而分两部分,各自以六股夹叙夹议,而议论处多,开隆、万以后凌驾之习。其法实际上源于宋代苏氏父子论体,即苏轼所谓“想当然耳”^{[22] 1115}者,故李光地谓“两闻字亦是折之以理,非据传记说也,故文中全不着相”^{[23] 237}。

其十,“附于诸侯,曰附庸”题文:“起讲”后二股讲“附”,二句过文启下,二股讲“诸侯”,又二句过文启下,六股讲“附庸”,二句过文结上,最后二股议论收结正文。此篇属于典制题,题目简单,故文多直叙,而其结构则正见作者反复致意处。故方苞谓:“只用清写,而举义该洽,波澜阔老。”^{[19] 363}从题目中拈出“附”、“诸侯”、“附庸”,以过文穿插于其间。王夫之谓王鏊文“钩锁”之法者,正于此处可见。

其十一,“大国地方百里”三节题文:“起讲”后三股讲题目,最后二股议论收结正文。典制题,难以发挥己意,故依《集注》而直说。正文“起讲”后以三股分讲题目,皆在敷衍原文与集注,其结构亦如题之结构,最后二股合讲议论,其不能恃才发挥者如此。故方苞谓:“无甚奇特,但局老笔高,又得说书之正体,遂使好奇者,镂心铄肝而不能至。”^{[19] 364}

从王鏊的上述十一篇经义,大抵上可看出其行文结构特点:首先,正文多用排比句式。其次,用不用排比与对偶,主要视题目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君赐食”一节题文、“邦君之妻”一节题文、“晋之乘”二节题文,以及“大国地方百里”三节题文,均不拘泥于排比对偶与否。其三,经义结构句式上的整齐与否,也根据题目结构及题旨表现的需要而定。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题文、“邦有道,危言危行”题文、“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题文、“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题文以及“吾闻

其以尧舜之道要汤”一节题文等皆如此。

排比对偶、结构严整形成王鏊经义文的基本特征。然考之上述十一篇经义,具有八股格典型特征的仅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题文与“周公兼思三王以施四事”题文。王鏊经义并不多写八股格的原因在于,经义八股格中正文由八股相连的结构组成,是经义文体格式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结构特征,故清人以“正格”^{〔24〕}^{〔553〕}称之。而顾炎武言“亦有连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25〕}^{〔951〕}。则指出经义文中的多数写法实际上都不属于八股中的正格。王鏊经义文中的多数篇章也是如此,行文尽兴舒展,隐然可见韩愈、苏轼古文的结构文脉,其中“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一节题文、“附于诸侯,曰附庸”题文两篇,皆多至十二股。王鏊经义文写作的才华,正表现在这些遵循规矩中的破规矩之处,收放自如,惟妙惟肖,因而受到千万学子的钦佩甚至顶礼膜拜。

王鏊有意将古文作法渗透到经义写作之中,并取得了推陈出新的效果,一时影响颇大。王世贞谓:“公凡两典乡会试,其程文为本朝冠,海内博士弟子亡不传习之;而千古文辞在河东、庐陵间,精简有法度。”^{〔26〕}^{〔145〕}认为王鏊的文章功力在唐宋古文大家中的柳宗元、欧阳修之间,总的特点是“精简有法度”。钱谦益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王鏊“文章以修洁为工,规摹韩、王,颇有矩法”^{〔27〕}^{〔267〕}。是说王鏊文章模仿了韩愈和王安石,然行文效果一样是“修洁”而有“矩法”。平心而论,王鏊的古文模学了唐宋诸大家,转益多师后未能突破前人藩篱,所以难称自创一格的古文大家,故后人评价难免见智见仁。然其行文精简,章法井然,外显韩、苏之形,内藏老、庄之意,在弘治年间却被公认为一种应时适宜的写法。尤其是将此种古文写法与用意改造经义,使得古文法度及文意浑然融于时文写作,形成时文新变潮流,结果是科场考生纷纷顶礼膜拜,对于热心于古文的王鏊而言,亦可谓桑榆之收。

三、王鏊对八股格定型所起的作用

对于明代经义八股格定型的时间,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从清初到民国初年,顾炎武、戴名世、胡鸣玉、李调元、商衍鎏等人皆认为完备于成、弘之时。而《明史》谓八股格式为明太祖与刘基所定;今人李光摩则推论定型于成化十一年^{〔28〕};本杰

明·艾尔曼说“八股文和成化十一年后的形式主义文风”有着密切的关系^{〔29〕}^{〔202〕},即认为八股文应该定型于成化十一年之后。应该说,明太祖之时及成化十一年在明代经义八股格产生过程中,皆为重要的时间节点,然而因此而确定八股格式定型于明太祖时或成化十一年,则还根据不足。笔者认为顾炎武等人提出的八股文定型于成、弘年间说,是较为稳妥的推论,基本符合文学史事实。

八股格的定型,是明初以来经义文体不断变革的结果,其趋势与古文发展的走向有着密切关系。从明初到明中叶文章风尚由质转文,对此昔人已有论及。如明末杨维斗云:“洪武、建文、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诸朝之文,质木款直、澹泊淳古,不可以文名,文之至盛也,而其弊或失之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之文,淹雅练达、华实相副,可以文名,亦文之至盛也,而其弊或失之拘。”^{〔30〕}^{〔17-18〕}杨氏所言,不仅指出了明前期古文由质转文的发展大趋势,也透露出明代经义的发展与古文之间的内在呼应关系。清初戴名世曾论成化前后经义写作风气的变化:“当其设科之始,风气未开,其失也朴陋而无文。至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来,趋于文矣。”^{〔31〕}^{〔106〕}说的也是明前期经义由重质向尚文的转变趋势,这与同期古文发展是一致的。

王鏊以文章宗韩师苏之所悟,化用古文之法为时文之作,变革经义文的传统写法,顺应了明初以来文风的转变趋势。王世贞谓:“明以时义试士而不能古,则济之(王鏊)应德(唐顺之)其于古文无几微间也。”^{〔32〕}^{〔210〕}指出两位时文高手同时也是古文大家,这样写出来的时文才可能有所创新。清初李光地亦说:“王守溪以韩文成句对《论语》,帖然也,出是则配焉而不类。然则后起之文,非恶其采摭子史杂书以后代言语附于经也,恶其不类焉耳。”^{〔33〕}^{〔684〕}韩愈之文是古文典范,韩文成句可与《论语》成句帖然相符,证明古文可以与经文浑然一体,因此经义化用韩愈古文成句就有了依据。在王、李二人看来,经义本有贴近古文之处,两者原可帖然相配,王鏊时文正是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后起之文则鲜有成功者,主要原因就在于出语俗杂而不类。四库馆臣对王鏊的时文也较为肯定:“鏊以制义名一代……盖有明盛时,虽为时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泛览百氏,以培其根

有关明代经义八股格的形成过程,可参见拙文《论明代经义八股格的形成过程》,《文艺评论》2013年第8期。

抵,而穷其波澜。鏊困顿名场,老乃得遇。其泽于古者已深,故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 34 172} 这段评论肯定了王鏊的成功在于其时文与古文的兼工,还肯定了王鏊的经义与古文都具有深厚根底。经义与古文的相融,体现出知识渊博并且贯通,所以能够以制义名一代。清初馆阁词臣的眼界、胸襟和见识,皆超越了明人的评价。

经义八股格的形成,是明代前期经义文体逐渐变化的结果,大致趋势是随着古文的变化而变。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鏊的经义表现出了渲染文采、格式拘谨的弊端。后人对此多有批评,如王夫之谓:“对偶语出于诗赋,然西汉、盛唐皆以意为主,灵活不滞……况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初非幕客四六之比。邱仲深自诩博雅,而以‘被发左衽’、‘弱肉强食’两偶句推奖守溪,此七岁童子村塾散学课耳。”^{¶ 18 1169}又谓:“守溪止能排当停匀,为三间五架一衙官廨宇耳;但令依仿即得,不甚相远;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徽纆而已。”^{¶ 18 1166}这两段话都直接批评王鏊的时文形式虽然工整,但还是空架子多,脱离实际,缺乏真情。八股格式流行之弊,在于对时文写作形成固定格式的束缚。高嶠言:“钱吉士谓明文以天顺前为极盛,至于化、治而衰。朱太复、陈素庵谓制义之坏始于守溪。”^{¶ 24 1415}可见钱禧(字吉士)及不少人都认为明代经义衰于八股格的定型,而八股格的定型又与王鏊直接相关。

经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取士文体,明初之后朝着重视文采和结构精巧的方向发展。王鏊生逢其时,身体力行,在经义八股格定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人俞长城(铜川)对此有着很高的评价:“制义之有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者也。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于理学为贤,于文章为圣;于六经为臣,于制义为祖,岂非一代之俊英、斯文之宗主欤?”^{¶ 4 1卷四}推奖之意溢于言表,虽有过誉之嫌,但从中也可看出王鏊在明代科举发展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王鏊的经义在结构形式方面有着创新之处,如“结构精整”和“善于用偶”皆是古文之法,王鏊移用于时文,初看并无豪华词语,但细辨文意周密,文章结构经得起推敲,因此被誉为时文正法。正如李光地所言:“某少时颇怪守溪文无甚拔

出者,近乃知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如唐初律诗平仄不尽叶,终不若工部字律细密,声响和谐,为得律诗之正。”^{¶ 15 1458}王鏊的重要地位,还与他的连捷魁选和屡主考乡会试直接相关。戴名世谓王鏊“少工举子文,既连捷魁选,文名一日传天下,程文四出,士争传录以为式”^{¶ 30 1卷二十八}。明史也称“鏊善制举义,后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 21 1卷一百八十一}。皆言王鏊从自作经义博取功名到长期主持文典,对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科考文风及经义文体的变革有着巨大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代洪武年间经义文体冒头、正文和结尾的三段式结构,是八股格形成的结构基础。然而八股格的起始点,严格意义上说是在永乐朝。永乐以后,政治上逐渐稳定,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藻饰太平之治,三杨“台阁体”为当时文坛所尚,文风渐趋于辞藻修饰,经义文体也由遵经重质趋向于重视结构严整,最终在成化、弘治时形成八股格式。王鏊的时文写作及主持科考活动主要在成、弘两朝,他顺应了当时的文风趋势,化用古文之法为时文,使得枯燥刻板的应试经义文面貌一新。

王鏊经义文的写作方法和结构特征,主要表现在语句修辞的排比对偶和结构上的严整谨密。这种写法使得其经义能够表现出一些古文的结构特色及文辞色彩,从而使场屋评文标准转向重视经义文的文章结构,这一点对人才选拔和官僚结构有着重要意义。自从八股文在明代成、弘之时定型以后,科举考试经义在明代中后期至清末的发展,都未能摆脱八股的基本格式,即王鏊经义文中表现出来的字词对偶、句式排比的显著特征。

明代经义文的发展,与宋元时最大的不同就是积淀出了八股格式。如果说王安石改变了自隋唐至宋代近五百年的人才选拔机制,那么王鏊的所作(定型八股)所为(主持科考),在明清官员选拔机制趋向客观公正方面,则有着其他人无法取代的影响力,这也是奠定王鏊在明清科举史中

四库馆臣谓王鏊“鏊困顿名场,老乃得遇”,似乎并不妥当。王鏊出生于景泰元年(1450),成化十年(1474)乡试获荐,次年即成进士,时年26岁,之后任朝官三十余年。

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正如明末清初陈名夏所赞叹的：“士穷经义考试，凡三岁，中是科者人以为能，且光荣极矣，岂非使人专一于孔孟之道者耶？守溪以前，仅仅数公有文名，而犹半涉宋体，

至于守溪，而法始备。”^[35]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科举考风为之一变，经义文体亦为之一变，在这发展定型的过程中，王鏊居功甚伟，堪称明代时文之魁首。

参考文献

- [1]袁黄.游艺塾续文规[G]//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2]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3]李乐.见闻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梁章钜.制艺丛话[M].上海:上海书店,2001.
- [5]邵宝.容春堂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6]王鏊.震泽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7]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8]王守仁.王文成全书[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9]归有光.震川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10]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11]郑献甫.制艺杂话[G]//同治辛未嘉平月黔南臬署槧本.
- [12]高海夫,等.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13]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4]蒋湘南.七经楼文钞[G]//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5]李光地.榕村语录[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6]杨士奇.东里续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7]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8]王夫之.姜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19]方苞.钦定四书文[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0]田雯.古欢堂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1]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2]叶梦得.石林燕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3]田启霖.八股文观止[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 [24]高嶠.明文钞三编[G]//黄秀文,吴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丛书汇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 [25]黄汝成,等.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6]王世贞.弇州续稿[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8]李光摩.八股文的定型及相关问题[J].文学遗产,2011,(6).
- [29]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30]杨廷枢,钱禧.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G]//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乙亥叶聚甫、张叔颖刻本.
- [31]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2]王世贞.弇州四部稿[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3]李光地.榕村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4]永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 [35]王鏊.王鏊集[M].吴建华,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欣杰]